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成果

生态城市美学

ECOLOGY AESTHETICS

周膺 吴晶一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成果

生态城市美学

ECOLOGY AND AESTHETICS

周 膺 吴 晶 /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态城市美学 / 周膺, 吴晶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308-07098-0

I. 生… II. ①周… ②吴… III. 城市学: 美学—研究 IV. B8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6789号

生态城市美学

周 膺 吴 晶 / 著

责任编辑 葛玉丹

装帧设计 周 膺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印刷 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320千字

版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098-0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城市就像梦境，是希望与畏惧建成的，尽管她的故事线索是隐含的，组合规律是荒谬的，透视感是骗人的，并且每件事物中都隐藏着另一件……城市也认为自己是心思和机缘的产物，但是这两者都不足以支撑那厚重的城墙。对于一座城市，你所喜欢的不在于7个或是70个奇景，而在于她对你提出的问题所给予的答复。或者在于她能迫使你回答的问题，就像底比斯通过斯芬克斯之口提问一样。

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形成的。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看不见的城市》

于是就有四种声音在鸣响：天空、大地、人、神。在这四种声音中，命运把整个无限的关系聚集起来。但是，四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片面地自为地持立和运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就没有任何一方是有限的。若没有其他三方，任何一方都不存在。它们无限地相互保持，成为它们之所是，根据无限的关系而成为这个整体本身。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荷尔德林的大地和天空》

目 录

序 言 生态城市和生态公民的美学识别	1
第 1 章 生态城市美学及其建构性	17
一、后现代状况与生态美学	17
二、生态美学思想及其演进	27
三、生态城市美学的建构性	36
第 2 章 生态城市美学存在论	43
一、生态论存在观	43
二、天地神人四方游戏	48
三、游牧与千高原	53
第 3 章 生态城市美学自然论	61
一、自然的返魅与城市的返魅	61
二、反俄狄浦斯与生态审美	67
三、深生态学意义上的审美观照	76
第 4 章 生态城市美学文化论	83
一、生态美学革命与稳态城市	83
二、从经济学关怀到美学关怀	90
三、生态批评与新人文观	96
第 5 章 生态城市美学社会论	103
一、隐喻的身体与世界之网	103

二、生态演替与看不见的脑	109
三、生态城市审美场域	114
第 6 章 生态城市美学语言论	125
一、生态恢复与设计结合自然	125
二、生态适宜性感知与反向规划	130
三、数字化生存与数字化修辞	139
第 7 章 生态城市美学系统论	147
一、机体主义美学	147
二、环境协同律	153
三、生态美学控制	158
第 8 章 生态城市美学范畴论	165
一、生态美与生态城市美学范畴	165
二、生生之谓美与生态城市审美关系	173
三、延异与后过程审美	179
主要参考文献	189

序 言 生态城市和生态公民的美学识别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城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城市化则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同时，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它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即使新哲学前景广阔，自然空间却正在消退，透明、中立、纯粹的城市空间幻象在逐渐趋向消亡。而自然空间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社会过程的起源和原始模式的基础。自然空间的消退不仅发生在物质环境中，同样也发生在人的思想中。因为，人类对于什么是自然、自然的原有状态等问题已不再关心，自然界的神秘力量也只是被转释为科幻的或迷信的世界，自然已经沦为各种社会系统塑造其特殊空间的原材料的产地。但是，人类不仅用眼睛、用理智，而且用感觉和身体来感受空间。这种感受越是详尽，就越能够清楚地意识到空间内部所蕴涵的矛盾。这些矛盾促成了抽象空间的拓展和另类空间的出现。因此，所谓城市革命实际上包含着差异之间的生产、空间之间的吸纳与兼容以及对自由时间的争取。最重要的是，在城市背景下，与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反空间”被生存、被捍卫，并最终得以发展。正是从这种所谓的城市的“空间缝隙”中，列斐伏尔看到了一种新政治的出现。他将空间划分为全球化空间、城市化空间与国家化空间三个层面，并认为城市不仅代表着地域与全球之间的中介，而且不断成为政治斗争和社

¹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Wiley-Blackwell, 1992, P.166, P.117.

会转化的场所。这些政治斗争对现有的权力压制构成了威胁，因为它们不再具有人为设定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并且蕴涵着生成异质空间的潜在性。列斐伏尔要求人们从现代主义所谓的可读性、可视性和可理解性的谬误中解脱出来，并断言：我们已经步履蹒跚地走在了社会空间科学的边缘，这种科学决不是企图达至一种彻底的总体性、达至某种体系或综合，而是试图把原来风格的要素重新结合起来，并以清晰的区分来代替含混不清；把分割的元素重新结合起来，并对新的结合体重新加以分析。而社会空间的生产，始于“对自然节奏的研究，即对自然节奏在空间中固化的研究。这种固化是通过人类行为尤其是与劳动相关的行为才得以实现的，即始于社会实践所塑造的时空节奏”。¹

列斐伏尔所谓的社会空间科学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城市生态学。当然其内涵涉及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而有关生态的专门科学是生态学。生态学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吸收了数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工程技术科学的研究成果，向精确定量方向发展，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学科分类也日益精细化。按所研究的生物类别，可分为微生物生态学、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等（甚至还可以再细分为昆虫生态学、鱼类生态学等）。按生物系统的结构层次，可分为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等。按生物栖居的环境类别，可分为陆地生态学和水域生态学。前者又可分为森林生态学、草原生态学、荒漠生态学等，后者则可分为海洋生态学、湖沼生态学、河流生态学等（还有更细的划分，如植物根际生态学、肠道生态学等）。生态学与非生命科学相结合的有数学生态学、化学生态学、物理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等，与生命科学其他分支相结合的有生理生态学、行为生态学、遗传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古生态学等。应用性分支学科则有农业生态学、医学生态学、工业资源生态学、污染生态学（环境保护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等。从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生态学发展理路是偏向于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的。但20世纪空前的生态危机则在警示我们：人类再也没有可能仅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研究生态系统了，而必须把自己也放进生态系统之内进行研究，以全面正确地评估和界定人类在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与影响。由此，生态学也越来越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相互融合的综合性的学科。1988年，国际科学联合会（ICSU）提出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简称IGBP），构建了全球生态学。全球生态学以地球生命系统的基本功能、性质、循环、变化以及人类的干扰和保护为研究

方向，将人类在内的拥有各种有机体和无机体的整个生物圈作为价值统一体来对待，摒弃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的缺陷，综合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方法，重视引起生物圈变化的人类经济活动因素和人类历史、文化及哲学等因素的作用，将触角深入到人与自然界关系的所有层面。人类认识自然的思维域界因此被拓展开来。

全球生态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是盖亚假说 (Gaia Hypothesis)。20 世纪60年代初，正在美国国家喷气动力实验室工作的詹姆斯·E. 拉伍洛克 (James E. Lovelock) 接受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关于火星生命研究的课题。拉伍洛克随即提出盖亚假说，认为可观测到的行星的大气构成远离化学平衡态则可能存在生命，并据此推断火星和金星均不存在生命。后来的实验结果证明了这种推断。在古希腊神话中，盖亚是宇宙浑沌的女儿，是地球母亲，而其他许多神都是她的后代。地球母亲曾被长时间作为一个象征性、隐喻性或浪漫性的概念，盖亚假说则使其变成一个科学或哲学概念。盖亚假说认为，地球不仅容纳了千百万种生命有机体，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生命有机体。岩石、空气、海洋和所有的生命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系统。“当我们从外层空间向地球运动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包围着盖亚的大气外围，然后看到的是诸如森林生态系统的边界，再看到的是灵活的动物和植物的皮，进一步是细胞膜，最后是细胞核和DNA。如果生命被定义为能够主动地维持低熵特性的自组织系统，那么，从每一个层次的边界之外来看，这些不同层次的系统都是活着的。”¹盖亚假说至少包含五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地球上的各种生物有效地调节着大气的温度和化学构成；二是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体影响生物环境，而环境又反过来影响生物进化，两者共同进化；三是各种生物与自然界之间主要由负反馈环连接，从而保持地球生态的稳定状态；四是大气能保持在稳定状态不仅取决于生物圈，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生物圈；五是各种生物调节其物质环境，以便创造各类生物优化的生存条件。尽管对盖亚假说仍存在不少争议，但它启示人类：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地球母亲的后代，人类既不是地球的主人，也不是地球的管理者，只是地球母亲的后代之一。要解决生态问题，既需要用系统或整体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要以共同行动来加以保护。

1978年，在加拿大艾伯塔大学 (University of Alberta) 召开“环境的视觉质量讨论会”，结集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名为《环境美学阐释文集》，最早提出环境美学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的概念。²而1988年贾苏克·科欧 (Jusuck Koh) 发表的《生态美学》一文，最早提出“生

¹James Lovelock, *The Ages of Gaia: A Biography of Our Living Earth*,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0, P.27.

²Barry Sadler & Allen Carlson, eds.,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Victoria, B.C., Canada: Dep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Victoria, 1982.

¹Jusuck Koh, *An Ecological Aesthetic*, *Landscape Journal*, 1988, 7(2).

²中国学术界认为生态美学是由中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最早提出来的,如刘精科《国内生态美学研究综述》(《中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等许多文章所说,这不符合事实。

态美学”(Ecological Aesthetics, Eco-aesthetics)的概念。¹环境美学或生态美学是列斐伏尔之社会空间科学或全球生态学的有意义的生发。²中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生态美学开展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已出版相关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其中也开始了生态城市美学(Ecocity Aesthetics)的理论构建。中国的生态美学也是在对近几十年来出现的认识论美学、实践美学进行总结、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实现的美学理论超越,是现代主体论美学向后现代主体间论美学转向的理论成果,代表了当代美学发展的最新方向。它既是对中西美学传统的继承与突破,又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思潮融入世界大环境的一种表征。

生态城市美学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时期提出的历史性学术命题和适应社会转型需要而发生的转型性理论,体现人类对城市和城市设计的古典认识论美学向后现代存在论美学转型的现实紧迫性与理论完备性的需要。在人类和城市面临极其严重的生态危机之时,人类迫切需要完善和强化生态审美意识,建设生态文明意义上的人文精神,以克服对城市的技术性或工程性处置态度和方式。在城市设计、建设和管理诸方面要引入生态城市美学这个维度,相关的学术研究如生态学、城市学和一般的美学研究等同样要引入这个维度。生态城市美学反对自然无价值的观点,主张自然生态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从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关系出发探究美的本质,从自然生命循环系统和自组织形态着眼确认审美价值,坚持自然权力和可持续生存道德原则,以重建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亲缘关系。目前,生态城市美学研究主要在如下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一是研究对象、范围以及范畴逐步明晰。对城市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由“空间论”转向“环境论”,并进一步发展为“生态论”,对城市美的界定也由“艺术美”转为“生态美”。二是基本确立生态存在论是生态城市美学的哲学基础。阿恩·奈斯(Arne Naess)的深生态学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论哲学是生态城市美学的哲学根基。生态城市美学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客二分的实践美学的束缚,深入思考人类存在、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人类物质生活空间与艺术生活空间看作有机共生体,在生存智慧上进行深层次的思想解析。三是将生态城市美学归为后现代美学。以后现代时空、后现代哲学和后现代文化作为思想背景,把反主体、反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主义作为基本的价值基础,并在事实上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精髓。四是将生态城市美学看作与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文化以及城市设计和生态设计既相对应又深度相

关的独立的学科。十分重视对吉尔·路易斯·勒内·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伊恩·伦诺克斯·麦克哈格（Ian Lennox McHarg）等人思想的研究与阐发。德勒兹非常重视生态共生、化生等问题，他提倡的生机论和一系列哲学、美学思想把人类与非人类（动植物、无机界）的空间关系构想为彼此链接、互动共生的生态圈和生物链，蕴含了比深生态学更为深刻的生态哲学和美学内涵。他提出的千高原、块茎、褶子、生成、游牧、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和逃逸线等概念对生态城市美学研究具有极大的思想启迪意义。麦克哈格的人类生态规划思想则代表了生态城市设计的主旨。当然，目前的生态城市美学研究还是初创性的。其理论建构还缺乏完整性，学科范围也没有厘清，基本理论框架没有比较成熟的构建，范畴体系远没有完善，“城市生态美”这个核心概念还难以作充分的有效性界定，理论性与实践性仍不可作充分的估计。

本书作者于2001、2009年先后出版《现代城市美学》和《后现代城市美学》两部专著。尽管它们都可以说是城市美学领域的开山之作，有全新的论域，但作者在论说上仍然意犹未尽。原因是城市美学于我们太切近而又不为当下所重视，因而总在发生问题、总要发生问题。所以又继续了写作。本书是国内外第一部生态城市美学专著，期望对生态城市美学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建构。探索领域主要包括生态城市美学发生的背景、生态城市美学存在论、生态城市美学自然论、生态城市美学文化论、生态城市美学社会论、生态城市美学语言论、生态城市美学系统论、生态城市美学范畴论等。本书认为，生态美学是后现代思想成果，而在生态审美困境中生态城市美学实际上成为生态美学的核心。生态城市美学要求人类在城市关系中构建人与自然的平等、共生的关系，这种审美关系是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说的“我与你”的关系。它从根本上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恢复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和同一性。如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所说的“自然的返魅”，城市也要返魅，即在更高水平上对自然的回归，实现“人的自然化”。“人的自然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本性自然化，二是自然不因人的过度干预而本真化。奈斯用“生态自我”来突出强调人只有纳入人类共同体、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之中才能“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过程。人不是与大自然分离的孤立个体，人的本性是由人与他人、与自然界中其他存在者的关系决定的。当人把其他存在者的利益视为自我的利益，方能达到所谓的“生态自我”境界。而只有在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意义上才能使人的本真的存在得以走向澄明，回到与万物和谐相

处的生态原位。就城市生活而言，这种关系是一种生态审美境界。自然美一直是美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回避的问题。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就将美学定义为艺术哲学，贬抑自然美。从生态美的角度来探讨自然美，是一种新的基础性理论建构。在流行美学中，自然美或者直接被看成“自然人化”的产物，或者被视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依附于人而存在。而生态美意义上的自然美被纳入人与自然的关系结构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城市的生态美是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审美问题之一。城市设计与建设往往在生态城市美学的思维场域里展开，具有自然与人文、科学和艺术之间的两极张力。生态城市美学场域突破流行美学或者艺术哲学的视域自闭，而进入了人域互为开放的境域。它以形式节律特征反映内在的存在意义或生命意义，从有利于人类当前与永远美好生存的角度建立一种崭新的、包含自然维度的“生态人文主义”，是人文主义精神在当代的新发展。流行美学没有发觉信息对于物质和精神的沟通、生成和统一的存在性意义，生态城市美学意义上的美学形象和形式是由信息所表现的存在的量、结构或“序”。这种信息负载于物质，却又超越于特定物质而在不同的物质之间传播、贮存、建构和转换。它不仅表现为物质流和能量流的运动，而且也是信息流的交换和循环。生态城市美学是一种新的信息存在方式。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解释佐贝伊德这座月光之下的白色城市的创建：

不同民族的男人们做了同一个梦，梦中见到一座夜色中的陌生的城市，一个女子，身后披着长发，赤身裸体地奔跑着。大家都在梦中追赶着她。转啊转啊，所有人都失去了她的踪影。醒来后，所有人都去寻找那座城市。没有找到城市，那些人却会聚到了一起，于是，大家决定建造一座梦境中的城市。每个人按照自己梦中追寻所经过的路，铺设一段街道，在梦境里失去女子踪影的地方，建造了区别于梦境的空间和墙壁，好让那个女子再也不得脱身。

这就是佐贝伊德城，那些人在这里定居下来，期待着终有一夜梦境再现。但是，无论在梦境还是在清醒时，谁也没有再见到那个女子。城里的街巷就是他们每天上班工作要走的路，与梦中的追逐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久而久之，连梦也忘了。

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做过同样的梦，他们便来到这里，并且从佐贝伊德街巷中看到某些自己梦中的道路，于是就改变一些拱廊和楼梯的

位置，使它们更加接近梦里追赶那个女子的景况，让女子失踪的地方再也没有任何可逃遁的出路。

最早来的人们想不通，是什么吸引那些人来到佐贝伊德，走进这个陷阱，这座丑陋的城市。¹

¹ 伊塔洛·卡尔维诺：

《看不见的城市》，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45—46页。

一切现实的城市其实都如同月光下的佐贝伊德。那里的街巷互相缠绕，就像迷宫和线团一样。我们的梦想、欲望就在这些线团之中纠缠、追逐。而生态城市在目前倒是一个虚拟的城市——只要人类纠缠于没有止境的欲望，它的现实的能生性就仍然缺乏。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致力于重构自然过程哲学，他认为今天已不再存在毫无中介的他在领域，无机界、有机界均处于普遍的联系之中，自然到处呈现出过渡和中间阶段。生物学中某些僵化的层次理论无非是陈腐的还原论图式，最终不得不让位于一种神秘的、整体论的自然哲学。像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浮士德》所云，这种自然哲学强调全体与万有的普遍联系：

瞧万物交织，合而为整，
相辅相成，相依为命！
钧天的诸力升降匆匆，
相互传递黄金的吊桶！
鼓着散发天香的翅膀，
从天空一直贯穿泉壤，
在万有中和鸣铿锵！²

²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

德：《浮士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2页。中世纪神秘哲学所说的大宇宙包括三个相互密切联系的领域，即尘世界、天界、超天界。这三界之间势力的交替被比喻为黄金吊桶上下运行。黄金吊桶又被解作汲光之桶（Schöpfbeimer des Lichts）。

从这一全体和万有的源泉中可以滋长出一种新的物质概念，它把机械的质量规定为生动的、萌发的力量组织，规定为冲动与效应的交换，并且为质的新事物的出现提供游戏空间和对立面空间。这种质的自然观的秘密在质的物质观的秘密之中。布洛赫的“自然”不是科学世界图景中所描述的那种同一物的永恒轮回，也不是实证主义所构想的那种僵死的、呆滞的自然，而是“能生的自然”、自我实现的自然，是一个不断新陈代谢、不断展现新形式和新阶段的过程。他在“未来参与”的意义上理解自然，把自然视为尚未全部、尚未完全显现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宝库，而每一个实现阶段又都产生前所未有的新的可能性。“现实的东西为可能性的海洋所围绕，而且一再从这片海洋中上升到一个新的可能性部分，特别是从无机

¹Ernst Bloch, *Tuebingen Einleitung zur Philosophie*, Frankfurt/Main, 1996, S.239.

²Ernst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Frankfurt/Main, 1973, S.235.

³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载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9页。

⁴“传记”在英文中作 Biography，除指对某人一生活动的文字记载外，也可指其生命活动本身。

⁵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序言第1—2页。

自然的物质中很可能拥有这种无或全有。”¹物质在虚无中发酵，在尚未中怀孕，在阵痛中分娩、充实和统摄一切。布洛赫把如此把握的质的物质图景称作“风景画或风景诗”，尽管它完全置身于物理学之外，但它又不完全置身于人类丰满的身体和自身的潜势之外。他断言，“在历史中，历史的活动者即劳动者是自我领会者；在自然中，自我领会者是所谓能生的自然或物质运动的主体，这几乎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明显地与劳动者的自我领会相联系，并且与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要求步调一致。”²

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中指出：“人是谁呢？是必须见证他之所是的那个东西……但人要见证什么呢？要见证人与大地的归属关系。这种归属关系也在于：人是万物中的继承者和学习者。但这两者处于冲突之中。那个使冲突中的事物保持分离而又把它们结合起来的東西，荷尔德林称之为‘亲密性’（Innigkeit）。由于创造一个世界和世界的升起，同样由于毁灭一个世界和世界的没落，对这种亲密性的归属关系就得到了见证。人之存在的见证以及人之存在的本真实行，乃是由于决断的自由。决断抓获了必然性，自身进入一个最高要求的约束性中。”

³当人由自然的动物演化为政治的动物或城市的动物以后，便开始丧失亲密性或约束性。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指出：“哲学作为传记的哲学，⁴其根源可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将自己的命运与雅典城过于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以至于他对大多数生命形式都没能进行考察。他的传记忽略了生物学。他曾这样说：‘你看，我爱好学习，可乡村和树木不能教我任何东西，而城市中的人则能教我很多。’”⁵“但人也是一个地球居民；就像城邦一样，地球也是人的居住地。人应该是完整意义上的宇宙主义者；他既生活在一个宇宙、一个世界中，也生活在一个城邦、一个城市中。不论在环境的还是政治的意义上，一个没有家园的人都是一个可悲的人。我们要皈依于我们的生存之地，而不是仅仅把环境理解为我们所有物（就像我们的人工制品那样）。人必定是土生土长的。伯朗宁（Browning）和苏格拉底一样地明智：我是地球上的土著居民/这种身份永不会变。”“新兴的城邦和那使人类成为造物中的佼佼者的文化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人们可能会因此而认为，人际伦理学是第一位的，种际伦理学是第二位的……[但]环境伦理学不是伦理学的边缘学科，而是伦理学的前沿学科。它不是派生型的伦理学，而是基础性的伦理学。那些对关心动物、植物、物种、生态系统和地表景观的行为嗤之以鼻的人，其实是很可怜的；他们很难超越其尘俗事务而看得更远；他们甚至不知道何处是

自己的皈依家园。不能认为,人际伦理学是强制性的,环境伦理学是自愿选择型的;也不能认为人际伦理学需要的是正义,环境伦理学需要的是仁爱,正义和仁爱都是义务所需要的。那些想使其品性趋于成熟的道德代理人,既需要发展出一种文化伦理,也需要发展出一种环境伦理。”¹“我要跟苏格拉底争论,因为我认为森林和自然景观能教给我们很多城市的哲学家所不能教的东西。同样,我认为神学家只致力于对上帝之城进行改造,是已从希望之乡——地球这座伊甸园——堕落了。因此,我的传记有一个从文化向自然的转向。更确切地说,我的职责是要引导文化正确地评价我们仍然栖居其中的自然,因为‘政治的动物’也还得服从生态规律。简单点吧,我是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²格里芬、汉斯·昆(Hans Küng)等认为,人类要走向荒野,不能仅仅依赖于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的构建,还需要构建一种新宗教或新神学。因为,现代理性或现代科学很难回答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生存在世界中,世界也生存于我们之中。这个认识包含着许多奥秘。为什么自然律和道德律如此冲突?为什么我们的理性不赞同自然中的生命现象,而必然形成与其所见尖锐对立的认识?为什么它必须在自身中发现完全不同于支配世界的规律?为什么在它发挥善的概念的地方,它就必须与世界作斗争?为什么我们必须经历这种冲突,而没有有朝一日调和它的希望?为什么不是和谐而是分裂?等等。上帝是产生一切的力量。为什么显示在自然中的上帝否定一切我们认为是道德的东西,即自然同时是有意义地促进生命和无意义地毁灭生命的力量?如果我们已能深刻地理解生命,敬畏生命,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怎样使作为自然力的上帝,与我们所必然想象的作为道德意志的上帝、爱的上帝统一起来?”这种宗教或神学思想的核心是对一切生命的敬畏。“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³但是,“后现代神学包含一种自然主义的有神论,它既与前现代和现代前期的超自然有神论不同,也与现代后期世界观的无神论自然主义不同。”⁴

人是栖息于自然和文化中的人,是历史地栖息于自然中的人;人也以个人身份栖息于自然中,每一个人都是作为地球上的道德监督者的人。

“人的生命故事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总是以个人传记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类想诗意地栖居于其中的大自然,是这样一个大自然:它虽历经沧桑,但却把生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整合成一幅有意义的故事图景。这

¹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50、455页。

²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序言第2—3页。

³阿尔伯特·史怀泽:
《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1、9页。

⁴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宗教》,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第5页。

¹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80页。

² Will Kymlicka & Wayne Norman, Return of the Citizen: A Survey of Recent Work on Citizenship Theory, *Ethics*, vol. 104, No. 2 (January 1994), P. 352.

³ 巴特·范·斯廷博根：
《公民身份的条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页。

并不是要把大自然仅仅当作创作人类故事的工具，正如我们在生活中并不仅仅把同伴当作工具来对待。毋宁说，我们已经领悟了‘生命存在于共同体中’这一观念的最丰富的内涵；根据这一观念，所有的生命都对这个可以在其上诗意地栖居的地球作出了贡献。”¹

威尔·金里卡 (Will Kymlicka) 和威利·诺曼 (Wayne Norman) 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最重要的话题是社会正义，80年代讨论较多的是社群与社群成员身份，而90年代的焦点则是公民和公民身份。² 巴特·范·斯廷博根 (Bart van Steenberg) 也认为，公民、公民权利与公民身份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社会难题和问题，如贫困、族群认同、跨国移民、女性问题以及生态问题等，似乎都可以通过公民身份的视角富有成效地加以分析。³ 作为风险社会的有力注脚，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的生态问题迫使人们从生态话语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与主体性问题，围绕生态问题而展开的国际对话与协商便成为识别并建构全球公民身份的极具代表性的话语渠道和修辞资源。尤其是当可持续性发展观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命名、阐释、表征和消解一切社会矛盾与政治矛盾的标准话语时，全球生态公民身份 (Global Eco-citizenship)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浮出水面。“公民”原是一个政治壁垒内的概念，它的功能是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与责任，而“全球生态公民”则将全世界视为一体化的整体，其主体身份的建构机制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对普世精神的识别与确认、对全球共享伦理的尊重与拥护，以及对全球公共事务的敏感与参与。全球生态公民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生态美学或生态城市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向度。

如果说区域生态运动致力于民族—国家所圈定的意识形态空间内寻求某种绿色身份，而全球生态运动则促使人们在地缘政治空间之外去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与标签，也就是去寻求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系统之外的全球生态公民身份。从城市角度来说，就是超越城市系统之外的生态公民身份构建。全球生态公民身份意味着通过对自我属性和特征的重新想象与建构，使得整个世界因为某种经由生态话语所建构的共同的、普遍的价值、理想、生命、信仰和真理而联结在一起，每一个个体都能自觉而自主地守护并履行这份“天赋”的权利和责任。这种强大的身份认同力量超越了现有民族—国家地缘格局下由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性别等因素所造成的偏见与隔膜。比如就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而言，这一正在逼近的全球生态危机无疑赋予了世界角落中的每一个个体一种共同的权利和责任，每个人的生命前所未有地被联系在一起。而基于普世生态伦理所凝聚起来的

身份识别与建构力量跨越了地缘政治空间内的种种偏见与歧视，全人类得以在由生态环境所构筑的“全球绿色公共领域”中达成和解与对话。当全球生态公民身份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识别和确认，并且作为稳定的核心价值体系支撑个体的行为实践时，个体实践也就上升为一个与世界对话和协商的全球公民行动，一种完全基于生态自觉而非政治压力的公共外交。

斯廷博根分析了解全球生态公民概念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扩展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认为，公民身份问题主要是一个权利享有者资格的问题。根据这一逻辑，可以把权利享有者的范围从当代人扩展到后代人以及动物。第二种模式是扩展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认为，公民身份不仅仅是一个权利和资格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公民的美德、责任和义务的问题；公民的首要特征是对共同体的认同、忠诚、责任与义务。“生态公民身份意味着这种责任向自然世界的延伸。”¹共和主义的生态公民理论强调扩展责任范围的重要性，要求人类把自身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自然的进化。第三种模式是扩展世界主义的公民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主义的生态公民身份理论是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和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综合，它既关注生态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更强调生态公民身份的全球维度。

斯廷博根认为，目前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全球生态公民。第一种是作为全球改革者的生态公民。这种生态公民强调生态问题的全球维度，承认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的局限性，并认识到全球合作与联合国体制对于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主张改革现有的国际关系，加强并改善联合国在解决全球事务方面的功能与职能。但全球改革者把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增长作为中心目标，认为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就能解决全球生态问题，具有明显的技术乐观主义特征。第二种是地球公民。如果说全球改革者关注的是对全球生态的管理与控制，那么，地球公民关注的则是对地球的关怀和关爱。地球公民强调地球作为养育者、作为栖息地、作为生命之根、作为生活世界的重要性，是对地球充满感激之情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在斯廷博根看来，扩展权利主体范围的模式“是否富有成效是值得怀疑的”，而扩展责任范围的模式似乎是更富有成效的。扩展责任范围的生态公民模式试图在参与的基础上与自然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但是单纯的责任扩展模式也是不充分的，只有把以参与为核心的责任观念与强调关怀地球的地球公民观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建构起一种切实可行的生态公民理论。²

¹ 巴特·范·斯廷博根：
《公民身份的条件》，吉林
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第167页。

² 巴特·范·斯廷博根：
《公民身份的条件》，吉林
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第173页。